

編序

中國大陸在 1970 年代末仍實行集體經濟，成長緩慢且民生困頓。然而，自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後，局面隨即轉變，發展動力強勁，經濟總量於 2010 年超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僅次於美國。若以兩岸三地來看，1981 至 2017 年間，其本地生產總值從原為香港的 6.3 倍增至 35.8 倍，原為台灣的 4.0 倍變成 21.4 倍（中華民國行政院主計總處，2018；World Bank, 2018）。

無論綜合國力、競爭力，或是國際地位與影響力，中國均今非昔比，其與周邊地區的互動和關係，亦有了巨大的轉變，對世界政經秩序的衝擊，甚至激起學術界對於西方自由體制在全球化過程中的存續思辨（如 Ikenberry, 2008）。中國崛起，尤其是其主導的「一帶一路」發展策略以及戰略布局對世界的影響，也引起世人廣泛關注，既有五花八門、愈演愈烈的「中國威脅論」，亦有對市場波動敏感的經濟學者說：「中國的好消息對全世界都將是好消息」（央視網，2017）。*The Diplomat* 雜誌曾先後刊出多篇以了解中國為主題的文章，從多角度分析其崛起在不同層面的效應與衝擊，其中 Friedman (2011) 的 Understanding China's Global Impact 一文，甚具代表性。

這些劇烈變化發生於全球經濟、地緣政治的合作與衝突，以及政治、社會、文化、科技、傳媒、人文與認同等領域；無論人們的政治偏好以及是否獲益，中國效應已經進入很多人的日常生活，構成利害與禍福關係，不論共榮或消長皆交織呈現，無人能置身事外，令「中國效應」（China impact）一詞無論在

國際關係、政經評論，或社交媒體上均大行其道，並因此吸引了研究華人世界學術界的關注（Schubert, 2016）。

所謂中國效應研究，旨在探究世界如何因為中國崛起（亦說中國再興）的事實或想像而改變，以及世界如何看待、接觸、參與，以至改變中國效應的過程，也就是對世界與中國的各種動態關係與變遷的研究。中國效應涉及人們對於過去歷史與認同的看法，故不局限於當代；各種動態關係發生的空間，涉及跨境、跨國、跨區域或跨體系的多層作用與效應傳遞，故不受限於地方、社區、社會或民族國家的疆界限定。中國效應研究的課題故常具有跨學科與跨生活領域範疇的性質（張茂桂，2011）。

對於中國效應，台港民眾都有直接深刻但未必一致的體會。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和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同仁，有感這「嶄新」現象尚缺乏實徵學術研究的問題，故於2012年開始合作，籌組進行台港的「中國效應」比較研究，深入而有系統地探討台港兩地各種可歸因於「中國崛起」的社會狀況、問題和變遷等議題，包括民眾對中國大陸社經政治前景的預期、對影響個人和本土社會的評估等。

此項合作研究的基本活動包括自2013年起，每兩年在台港同步進行一次全社會的隨機抽樣民意調查，然後根據調查所得撰寫論文，再召開學術研討會，¹作多層面和多角度的討論。本書是相關民意調查和研討會的成果，結構上分為三個部分：中國效應、政經拉扯和交流互動，分析範圍則涵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傳媒和民間交流互動等眾多層面。

1. 包括2013年11月30日在台北政治大學舉行的「中國身影下的港台社會與民意反映」研討會，和2017年12月4日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舉行的「中國效應與台港經驗」工作坊。

第一部分分析民眾對中國效應的觀感，收錄四篇論文。在第1章「『中國好，台港好』？台港民眾對『中國效應』的評估」，蕭新煌、尹寶珊和鄭宏泰運用2017年民意調查數據，勾勒在台港與中國大陸經濟關係日益緊密、人民交往愈趨頻繁的環境下，台港民眾如何評價「中國關係」對本土社會的影響，並借鑒相關理論，探討經濟利害得失、情感認同強弱，以及社會接觸多寡三方面個人因素，如何影響民眾的中國效應評價。作者首先發現，台港民眾對政治效應的評價，都以負面者居多；但台灣人對經濟效應的評價，卻遠低於香港人；兩地民眾對大陸經濟和政治前景的評估，則好壞參半。其次，民眾大多未認同與大陸是「命運共同體」的關係。這一方面表現於自覺家庭經濟依賴大陸、承認情感認同大陸，以及與大陸維持較頻繁接觸的民眾，均屬少數，台灣尤甚；另一方面，民眾雖基本認同「中國好」，如約半數相信其經濟會維持發展、政治會走向民主；但對於「中國好，台灣／香港好」，台灣是傾向負面，香港則存在矛盾。其三，影響中國效應評價的因素，台港不盡相同。對經濟效應評價具正向解釋力者，台灣只有政治展望，香港則有國族認同、社會接觸、經濟展望和政治展望。對政治效應評價具正向解釋力者，台灣有經濟依賴、國族認同和政治展望，香港則有經濟依賴、國族認同、經濟展望和政治展望。鑑於大陸的政經發展存在隱憂、認同中國的台港年輕人大幅減少、社會接觸對中國效應評價的影響力偏低，作者預期台港與大陸的融合前景不容樂觀。

在第2章「台灣民眾對於『同文同種』想像的初探」，張茂桂指出，一般用來衡量國族認同的「台灣人」與「中國人」調查，主張台灣民眾的「台灣人意識」有逐年上升，而「中國人意識」則不斷下跌的趨勢。然而，作者根據2011和2015年的民意調查所得，發現多達六成民眾同意「兩岸人民是同文同種」。這顯示，不少自我定位為台灣人而非中國人的民眾，也

同意「同文同種」的觀點。學術界對這看似矛盾的現象，一直缺乏深入的探究。作者指出，「同文同種」固然是兩岸交流中的流行話語，惟意義很不精確。當考慮所有變項時，具最大影響力的因素是政治世代：年輕的「中國因素世代」尤不同意「同文同種」的觀點，而最年長的「威權大中國世代」與較年長的「危機愛國世代」，則相對同意「同文同種」。其次是對兩岸發展的預期：對中國大陸未來發展較樂觀的民眾，也會較容易同意「同文同種」；反之，如果是預期台灣未來樂觀、中國大陸不樂觀，就會較傾向不同意「同文同種」。再次是民眾的政黨支持傾向和性別：泛藍政黨支持者和持中立態度者，相對於泛綠政黨支持者，以及男性相較於女性，都增加同意「同文同種」的機率。

在第3章「中國效應下台灣民眾的選擇難題：經濟利益或國家主權」，陳志柔利用2013、2015和2017年的民意調查資料，探討台灣民眾對於兩岸交流協商中，經濟利益或國家主權的取捨衡量。作者指出，當民眾被問及：「對於兩岸交流的協商，有人認為台灣的經濟利益重要，有人認為台灣的國家主權重要，請問您認為哪一個比較重要？」時，認為經濟利益比較重要者（約佔五成至五成半），略多於認為國家主權比較重要者（約佔四成二至四成半）。對於選擇經濟利益還是國家主權，個人的社經地位、政黨支持、台獨情感、對中國大陸政府的評價、對中國大陸經濟的判斷等因素，都有顯著的影響。大致而言，高社經地位人士（以收入和教育程度為指標），比低社經地位人士，傾向認為經濟利益比較重要。泛綠政黨支持者和有台獨情感者，較泛藍政黨支持者和沒有台獨情感者，傾向認為國家主權比較重要。對中國大陸政府評價高者、認為中國大陸的經濟會一直維持快速發展者，都較傾向認為台灣的經濟利益比較重要，反之則認為國家主權比較重要。另外，就人口特質而言，

女性較男性傾向認為經濟利益比國家主權重要；年輕世代較中年世代傾向認為國家主權比經濟利益重要。

在第4章「中國效應對台港民眾政體評價的影響：政體競爭觀點的初探」，林文正和林宗弘指出，政體存續多少取決於執政績效，尤其是經歷政體轉型的新興民主國家，民眾往往以舊政體作為比較的基礎，若績效不彰，可能會令民眾失望，甚至釀成執政當局的合法性危機。作者運用「政體競爭」的概念，以2013和2016年的調查資料為例，探討政體對民眾的「政體評價差距」影響，並以「政治社會化」與「制度績效」觀點，來解釋不同政體對個人的社會化效果；此外也觀察時間因素所產生的影響。中國大陸的威權體制，對於台灣民眾是現行民主體制的比較標的，對香港民眾則是現行體制的對照來源。研究發現，政治社會化與制度績效可以有效解釋台港民眾政體評價的差距，其中制度績效（包括台港政府評價、大陸政府評價、大陸經濟持續發展與經濟衍生的政治效果）對於評價差距有重要的影響，這說明制度間的績效表現，是台港民眾的評價對照來源。最後，比較兩波調查的時間效果，可發現台港民眾在政治社會化因素出現相近的變動，這很可能是2014年兩地先後發生大型的社會運動，使政黨傾向或身分認同因素對政體評價的影響力增加，這表示政體評價差距，除考量制度績效之外，還須關注政體競爭過程中對個人政治社會化的潛在影響。因此，政體競爭的角度不但能反映台港民眾如何看待不同體制的差異，也為政治社會化帶來新的討論議題。

第二部分探討中國效應導致的政經拉扯，共收四篇論文。對於兩岸關係，「維持現狀」既是台灣的主流民意，也是現政府的執政定位。有鑑及此，廖美在第5章「鞦韆或槓桿？政治維持現狀與兩岸經濟發展的弔詭」，將民眾選擇「維持現狀」的內涵歸為兩組：一是如同鞦韆，在一定範圍內擺盪，但其實沒有進退；另一如同槓桿，藉維持政治現狀，以尋求經貿發展

的利益。作者繼而檢視「維持現狀者」對兩岸經貿關係的評估，從中探究他們的「組內」差異，以及影響其差異的因素。作者認為，民眾選擇維持現狀，直觀看似「不求變」，但選擇「當下」，實已包含對未來的預期。民眾對兩岸經濟發展的評估，不管樂觀或悲觀，都在對政治後果和經濟利益進行權衡。總言之，作者使用鞦韆和槓桿作類比，旨在針對兩種態度的理念型提出可檢證的假設：其一，對兩岸經濟發展持悲觀態度者，選擇維持現狀是基於政治後果考量，如同坐在擺盪的鞦韆上，識時務地堅持不前進策略；其二，對兩岸經濟發展持樂觀態度者，選擇維持現狀是基於政治槓桿操作，以期獲取最大的經濟收益。

在第 6 章「追求民主，還是其他？港人對中央政府支持度下降的原因」，黃子為、尹寶珊和鄭宏泰以 2014 年數十萬港人上街支持佔領運動，抗議中央政府有關香港政制改革的決定，並要求民主改革一事作為切入點，指出有輿論認為，港人對中央政府不滿，是本地民生問題叢生，以及香港與大陸融合產生諸多衝突所致，民主因素未必是主因。然而，當作者運用 2017 年民意調查數據作檢測後發現，支持民主的港人，無論在兩地關係對香港民主政治的影響、兩地經濟關係對維護「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影響、中央政府的整體表現上，均給予較負面的評價，亦較認同佔領運動，主因是他們認為中央政府阻礙香港的民主發展。此外，分析結果顯示，身分認同、兩地關係對香港經濟和社會的影響評估，與佔領運動認同感沒有顯著的關聯。因此，作者認為，單憑加強港人國民身分認同，和增強兩地融合帶來的經濟利益，未必能夠有效增加港人對中央政府的支持。

在第 7 章「人心何價？香港與內地經濟和政治關係認知的影響」，梁凱淇和黃子為集中探討京港政要常說的「國家好、香港好」是否廣受港人認同。作者提出三個問題：一、港人是否相信香港在國家經濟布局中，兩地能互利共生？二、港人是否相信更強勢的中國和更緊密的兩地經濟關係，對香港有利？

三、香港的人心可否因此被收攬？然後利用 2017 年的民意調查數據，分析「國家好、香港好」的論述，到底獲得哪些港人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的認同，以及探討港人對兩地政經關係的認知，如何影響他們對國家的認同，包括中央政府的評價和身分認同，以了解此論述能否在香港回歸 20 年之際達到人心回歸的效果。主要的結果有三：其一，年輕和高學歷人士，較不傾向認為「國家好、香港好」；其二，相信「國家好、香港好」的「一榮俱榮」者，對中央政府的評價，都較其他人正面，顯示收攬民意需要政經雙管齊下；其三，「一榮俱榮」者的身分認同，與其他人沒有統計上顯著的差異，經濟關係認知是「此長彼消」者反較傾向認同中國人身分。簡言之，相信「國家好、香港好」與中央政府評價呈正相關關係，與身分認同則沒有關聯。

在第 8 章「意料之外的政治覺醒：世代與港人的身分認同及政治取態」，葉瀚璋和趙永佳指出，中國政府於 2014 年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 2016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簡稱「831 決定」），觸發香港自回歸以來規模最大的社會運動，但那場運動其實醞釀已久，並非空穴來風，在歷時 79 日的佔領運動之後，又捲起了本土主義浪潮，令本土認同從此被喚醒、社會朝兩極分化之說甚囂塵上。為驗證此說，作者運用 2013 和 2017 年的民意調查數據，分析港人身分認同和政治取態的變化，以及世代間的差異。研究結果清楚展示，這場運動對年輕人影響輕微，但帶來了較年長者的「政治覺醒」。作者因而推斷，香港將面臨更嚴重的世代政治衝突。

第三部分着眼台港與中國大陸的交流互動，共收四篇論文。在第 9 章「兩岸交流之利與台灣社會：國民黨執政時期（2011–2016）的探究」，張茂桂指出，2012 年，台灣的國民黨擊敗民進黨成為完全執政黨，相關分析多認為兩岸和平與預期經濟紅利是決定因素，但到 2016 年，在和平與經濟紅利取得「落實」

機會之後，選舉結果卻是國民黨大敗、民進黨重掌政權。這現象帶出的問題是：2016年之前的兩岸經濟紅利究竟讓誰獲利？民眾如何看待這些「紅利」？這樣的獲利分配與台灣社會持續存在的分歧有何關係？為回應上述問題，作者運用2011、2013和2016年的民意調查資料，發現民眾對於「整體經濟是否有利」的評估趨於分歧的觀感，抵銷了早期對經濟紅利的正面期望效益，但對於「個體家庭是否受惠」的現實評估，則確實有趨高的情形。此外，民眾對家庭獲利與否的觀感，不純粹是政治立場的延伸，而是與年齡、族群、教育程度、地區發展程度等分歧有所重疊。最後，根據作者的判斷，同樣的經濟利益評估問題，存在究竟是「前瞻」（預期）或是「回顧」（現實）評估的差異，測量的時間點與民眾的參照點，有不同的政治影響。此外，民眾對於整體和個體的受惠評估，只有中度的相關關係，且兩者呈現不同的發展趨向。

第10章「有關係，沒關係？談台港民眾與中國大陸的關係」的分析重點自然是社會關係。鄭宏泰、蕭新煌和尹寶珊指出，在處理台港與中國大陸的接觸交往議題時，社會關係是基本的切入點，學術界與政界尤其認同增加接觸交往，會影響民眾的態度與行為。作者根據2017年的民意調查所得，發現台港民眾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強弱，會影響他們對大陸的態度與行為，呈現了關係較強者，對大陸政府的評價較正面，對大陸社會的前景抱較大信心，並較支持家人到大陸發展。然而，民眾與大陸有否關係的影響，則不盡相同。儘管在台灣民眾中，與大陸有或沒有關係，仍會影響他們對大陸的態度與行為；但香港民眾卻非如此，背後所反映的社會現實，是香港仍有濃厚的移民社會色彩，上一代和新世代中同樣有很大比例的大陸移民，而新舊世代亦會在不同生活領域接觸來自大陸的親友，可見就算那些與大陸沒關係者，亦不能置身於社會關係的場域之外。

第11章「內地來港年輕移民二十年以來的社會流動」關

注香港回歸後年輕移民的收入轉變。郭樺和方偉晶指出，移民的經濟融入程度，是移民社會流動的重要指標。在分析移民的經濟融入時有兩個主要視角，其一關注移民的人力資本因素，其二關注移民的移居時間長短，和移居時的年齡因素對其社會流動的作用。作者結合兩種視角，運用2006和2016年香港中期人口統計的5%抽樣樣本，以及Myers和Lee的「雙同期群分析」，比較年齡同期群和來港時間同期群在2006至2016年的收入表現。研究結果顯示，在控制教育程度後，於1997至2006年來港的移民，他們的收入與本地人已沒有顯著的差別；25至34歲時來港的移民，他們的收入與本地年輕人的差別，相比年長時來港的移民小。據此推論，香港回歸後，針對移民的制度環境改善，以及移民的教育程度提高，是提升移民經濟融入程度的主要原因。

第12章「傳媒的視角與力量：台港民眾的不同看法和感受」，分析中國效應下台港民眾如何看待俗稱「第四權」的傳媒，在報道新聞時的手法和影響。文中，趙永佳、張茂桂和鄭宏泰首先回顧二戰結束卻掉進冷戰時期後，台港與中國大陸如何利用傳媒發動宣傳戰與輿論戰，影響政經政策，並指出進入新千禧世紀以還，傳媒生態雖有巨大變化，但因其仍被視為具有治理「制高點」作用，依然備受各方重視。然後，作者運用2013年的民意調查資料，展示台港民眾對兩岸三地新聞關注程度的差別，以及對傳媒中立性的看法，最後則綜合各種資料，分析並思考傳媒如何在不同層面上，影響了台港的政治氛圍與社經發展方向。

總括而言，本書各篇論文大都運用由台港「中國效應」研究小組進行的民意調查資料，就台港與中國大陸的關係現況和趨勢，提供敏銳的觀察、實徵的數據和客觀的分析。由進行民意調查、籌辦研討會，到本書得以問世，我們要特別感謝此一計劃的推手，時任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蕭新煌教授的

鼓勵與促成，以及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兩個機構的長期支持。另外，對參與歷次調查和研討會的專家學者，我們由衷地感謝，而香港亞太研究所的鍾雪怡、李明珠、梁月蓮和陳韻晴協助資料分析和文稿校對等工作，以及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蔡宜紋、王振瑜、施翔云、洪鳳謙、楊靜雯、吳家裕、周偉賢諸位研究助理和林肇豐博士等協助，在此也謹誌我們的謝忱。

張茂桂、尹寶珊、陳志柔、鄭宏泰
2018年7月

參考書目

中華民國行政院主計總處。2018。「國民所得統計摘要（107年5月更新）」（<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33338&ctNode=3099&mp=1>）。

央視網。2017。「IMF首席經濟學家談中國經濟：中國的好消息對全世界都將是好消息」，10月11日（<http://news.cctv.com/2017/10/11/ARTIIs6qYJszue4z2QBSYg6N6171011.shtml>）。

張茂桂。2011。「倡議『中國效應研究』的觀點」，《臺灣社會學會通訊》，第72期，頁25–30。

Friedman, Edward. 2011. "Understanding China's Global Impact," *The Diplomat*, 15 February (<https://thediplomat.com/2011/02/understanding-chinas-global-impact/>).

Ikenberry, G. John. 2008.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87(1):23–37.

Schubert, Gunter (ed.). 2016. *Taiwan and the "China Impac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London: Routledge.

World Bank. 2018. "Data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home>).